

第一章 对外贸易的产生及演变

第一节 早期对外贸易的历史概观（上）

历史时期云南对外贸易处在一种怎样的状态？这是研究云南对外贸易的一个起点，也是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同志们所关心并力求加以解决的问题。从地理角度看，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云南属于内陆地区。复杂的地形，远离政治中心，由此决定了它的闭塞特征。又由于其地处沿边地带，与邻国毗连，这又使它具备了对外交往的有利条件。因此之故，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云南始终在同闭塞作斗争，为建立同外界的交往与联系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正是在这种苦斗中，闭塞的云南成为我国最早踏出国门，开展对外交往的地区之一。对外贸易也伴随着对外交往的建立而产生、对外交往的扩大而扩大。分析研究早期云南对外贸易，既不能盲目拔高，更不能人为地加以否定。本章从云南对外交通的开辟、对外商业关系的确立、对外贸易的拓展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对对外贸易活动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加以探讨，从而认识早期云南对外贸易究竟处于怎样一个历史阶段。

— “西南丝路” —— 通往世界的桥梁

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架起了云南同外部世界之间商业和文化交流与联系的桥梁。那么，这条丝绸之路究竟始于何地，达于何处，又开通于何时？现代学者多把它追溯到公元前 4 世纪。认为至迟在公元前 4 世纪就开通了一条由中国南部、西南部经昆明达于缅甸、印度等地区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

探讨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必须首先了解中国古代王朝对西南边疆的开发与治理。正如有学者指出：“欲知滇缅交通之由来，须以追溯秦汉间川滇之贸易通道为其权舆。盖因当时西南夷中之滇国昆明，固一面交通印缅，一面交通巴蜀，而为其中枢也。”^①这一认识是十分正确的。昆明处于南方丝绸之路的中枢，古代中国，不论是南方的荆楚，还是西南的巴蜀，欲交通印缅，必先交通滇国。

古代中国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开发，大体上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即荆楚向西拓展，巴蜀向南开疆。可是，这种开发究竟起于何时？

据史籍记载，楚国远在春秋中期以后就曾不断向古云贵高原开拓疆土，建立交通，使之实际成为楚国的西疆。今云南东部曲靖、富源、陆良、寻甸一带，为古劳浸、靡莫居地。^②《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滇国“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徐中舒先生谓其首领都是楚国贵族。^③这些贵族与楚的关系如何，今云南陆良县境的刘宋《爨龙颜碑》有记述。其碑文谓爨氏是“颛琐之玄孙，才子祝融之眇胤（苗裔）也。”并谓爨氏先人曾“霸王郢楚”，“诏德于春秋”的令尹子文是其祖宗。这一带的濮人、劳浸、靡莫及爨氏因与庄蹻为同族，故《史记·西南夷列传》说与滇国“皆同姓相扶”。^④《汉书·西南夷列传》则说：“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劳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楚威王（前339～前329年）时，楚庄王苗裔庄蹻，循长江略巴黔中以西，

① 夏光南《中印缅甸交通史》，中华书局民国37年8月初版，第6页。

② 杜预《春秋释例》（《左传·文公十六年》《疏》引）及〔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称其为濮越或百濮。

③ 徐中舒《夜郎史迹初探》，载《夜郎考》（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④ 朱俊明《楚向古云贵开疆史迹钩沉》，载《楚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200页。

占据滇池区域。“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地平，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乃以其众王滇。为长久计，变服，从其俗，以长之。”^①庄躡入滇为滇王，独有一方基业，更使楚国势力达于滇池区域。汉时滇国统治者仍为楚王族的后裔，故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十分肯定地说：“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还说，夜郎之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正义》谓：“靡非在姚州北，……即靡莫之夷。”此“靡莫之夷”的靡非，亦本江汉濮人。^②从地域范围来看，靡非即在现今云南楚雄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其北抵金沙江两岸，南及礼社江。^③地跨滇南、滇西南和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的古哀牢国与楚的关系又如何呢？是时，古哀牢为一民族部落的旧称，与“夜郎”、“滇”、“邛”相类，也已进入奴隶社会，具备了国家形式的政权组织，故称其为国。其地相当于今天保山、德宏、临沧、怒江、耿马、思茅、西双版纳和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广大地区。^④由此可见，古哀牢地处控扼云南交通外国之咽喉，其地与楚人曾经经营过的滇东广大地区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与楚的联系也是可以肯定的。

从上述所举史料来看，楚国在古云贵地区确实进行过历次开拓，并对这一地区的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至于其势力所及，据研究，到楚后期，其西疆达于今哀牢山脉南北，其北在古靡非

① 《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传》。

② 朱俊明《楚向古云贵开疆史迹钩沉》，载《楚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200、201页。

③ 对于靡莫、靡非、哀牢部族的问题，史学界说法不一，此处依已故方国瑜先生之说。详见《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一书。

④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22页；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286、287页。

附近的金沙江畔，甚至可能抵达蜀之邛崃山麓。^①对于这样辽阔的西域——古云贵地区的开拓，与楚国腹地荆州地区究竟有着怎样重要的经济联系？这还得从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材料中去寻找答案。具体来讲，这种联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为黄金的东运，二为楚丝的西来。从史籍记载来看，荆州不产黄金，然而楚国却实际拥有大量黄金，成为其金融支柱和兼并之资。楚国还是当时最先采用黄金铸币的诸侯国，其数量很大，种类繁多，如郢爰、支爰、陈爰、融爰、卢金、郢等。其实物在湖北、陕西、安徽、河南等省均有发现。^②楚国黄金来之何处？其答案就要在楚国控制的广大疆域中寻找。自古以来，云南是一个重要的黄金产地。《韩非子·倒言七右经》说：“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这里的“丽水”即指云南境内之金沙江，为当时靡莫的属地。哀牢所在的澜沧江亦产黄金，《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哀牢地“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博南县，“西山高四十里，越之，得澜沧水。有金沙，以水洗取，融之，为黄金。”这些地区的黄金，最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得到了开采。这些黄金开采后便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内地，其中也包括国都，从而充实着楚王国的国库。正因如此，楚国虽不产金，却有大量的黄金用作货币流通天下，作为财富用作交通诸侯、兼并天下的资本。^③这当然不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答案就在于此。

楚地是古代中国丝织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楚向西南开拓

朱俊明《楚向古云贵开疆史迹钩沉》，载《楚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202页。

② 《考古》，1873年第3期，1977年第2期；《文物》，1965年第1期，1972年第1期，1980年10期。

③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286页。

疆土，开采黄金的同时，也把丝运入西疆，从而形成了荆楚与云贵两地区间紧密的经济联系。不惟如此，楚丝在输入云贵地区的同时，而且还经滇池地区转输缅甸及印度一带，这也是有据可考的事实。在古印度文献中就有 Cina 一词，据季羨林先生著文说，Cina 就是“脂那”、“支那”，即中国。^① 楚位于我国腹心地区，其丝对外输出及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季羨林先生还在其《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一文中，从古代蚕丝的发现，蚕丝在西域的传布，蚕丝在西南的传布以及蚕丝输入印度的过程等考察入手，肯定了中国内地的丝织品先传到云贵地区，然后经滇缅通道转输到了印度的基本事实。另据苏仲湘先生《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一文旁征博引，认定“支那”一词即指楚地无疑。^② 荆楚能为古印度人所熟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双方存在着经济联系。

楚国开拓西疆——古云贵地区，除了经济上的联系外，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其较具代表性者，有如铜鼓、玉器、方瓦铜斧、靴形铜钺、喇叭形茎首一字格短剑、铜镞于、铜葫芦笙及丝织品。从滇池和荆楚两地区考古发掘的文物来看，他们之间都具有显著的渊源关系。^③

巴蜀对南中的经略开发，其历史更加久远，而且最为直接，交通联系更加频繁。据史家研究，古代四川交通云南以及假道云南交通现今之东南亚及南亚地区，其所取用的交通路线主要有五条：零关道、五尺道、南夷道、滇越进桑道、滇缅印永昌道。这些交通路线从不同的方向向南、西南幅射，进入云南以后，便与

① 季羨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5月版，第76页。

② 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

③ 朱俊明《楚向古云贵开疆史迹钩沉》，载《楚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204~209页。

云南境内各民族地区的交通网络相接，最后通向遥远的国境线以外同世界相连。

(1) 零关道 零关道是古代川滇交通的一条重要交通路线。晋代左思《蜀都赋》称杜宇王时“廊灵关而为门”，常璩《华阳国志》称杜宇时“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杜宇王执政时代，约在春秋之世，或西周之末，即在公元前 8 世纪之时。^①也就是说，公元前 8 世纪时，蜀国便以零关为门户，南下与滇南及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相互交往了。

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开通的零关道，秦代已相当通达。《史记·司马相如传》称：“邛、笮、冉、犍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为郡县，至汉兴而罢。”汉初欲通西南夷古道，因“费多，道不通，罢之”^②到元光五年（前 130 年）司马相如“略定西夷，邛笮、冉犍、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隘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悦”，秦末汉初闭塞的古道又复通畅起来。元狩元年（前 122 年），汉武帝派遣使者间出探求通身毒国的通道，其中所走的一条路即是灵关道。元鼎六年（前 111 年），司马迁也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③元封二年（前 109 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深、靡莫，以兵临滇。……滇举国降，请置吏入朝”，遂设益州郡。^④元封六年（前 105 年）汉兵降服昆明夷，又设叶榆等数县。至此，零关古道的梗阻尽除，道路得以畅通。商贾便沿此通道贩运笮马、犍僮、牦牛以及丝织

①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10 月版，第 120 也就是说，公元前 8 世纪时，蜀国便以零关为门户，南下与滇南及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相互交往了。

② 《史记》卷 123 《大宛列传》

③ 《史记·太史公序》。

④ 《汉书·西南夷传》。

品、铁器、其他金属制品和食盐，借以谋取巨利。

在这些交换物品中，笮马为建昌及滇西一带所产的良马。

《新唐书》说：“越巂之西多荐草，产善马，世称越巂骏。始生若羔，岁中纽莎系之，饮以米泔，七年可御，日驰数百里。”樊绰《蛮书·云南管内物产》说：“马出越巂川东面一带，冈向西，地势渐下，乍起伏如畦畛者，有泉地美草，宜马。初生如羊羔，一年后，纽莎为拢头縻系之。三年内饲以米清粥汁，四五年稍大，六七年方成就。尾高，尤善驰骤，日行数百里。”古代云南产骏马，已为众多史籍所详载。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也说：“蛮马出西南诸番，多自毗那，自杞等国来。自杞取马于大理，古南诏也，地连西戎，马生尤蕃，大理马为西南诸蕃之最。”清代檀萃《滇海虞衡志》讲到南宋时期，曾在广西桂林开设马市，“南渡偏安，于静江易马。”可见，蛮马交易历史久远，以至给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僰僮为今四川安宁河及金沙江流域之夷族。《汉书·地理志》载：“巴、蜀、广汉，……南贾滇、僰僮。西近邛笮马、旄牛。”可见，僰僮当作一种特殊的商品，可以购买。这些作为特殊商品的奴隶，包括劳深、靡牧、嵩、昆明、哀牢、姑缯、同师、夜郎等等诸民族。因他们不谙内地语言风俗，须奴隶商购入后进行调教后方可售供使用，统称为“滇僰”；那些已习汉语汉俗，奴隶商购入后不须调教即可出售使用者，称为僰僮。^②汉代蓄奴制度盛行，蓄奴在内地及边疆都视为合法，富裕之家可用金银购买，如司马迁所言蜀卓氏、程郑、寡妇清之流，为富蓄奴以千计。同时，又通过剥削这些奴隶的劳动获取更大的剩余价值。旄牛即羌地特产牦牛，生活在高寒山地，内地不

① 《新唐书·南蛮列传上》。

②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116页。

能生长，其皮、肉、毛为内地所重，当时主要市场在苻都（沈黎郡地），内地商贾来此购买并就地剥制毛皮销往内地。^①铁在古代巴蜀地区采冶甚多，临邛、武阳都是重要产地。南安、定苻之南出盐，朱提出银，邛都之南山出铜，这些都为南中各族所必需。蜀布、邛杖、枸酱亦为可供外销的商品。这期间，由于商品贸易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富商巨贾。《史记·货殖列传》说：蜀卓氏“即铁山鼓铸，运筹策，顷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又说程郑“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零关古道在漫长的岁月中，为勾通川滇之间的经济联系，进而把川滇引向广袤的世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条古道，大体上有两种走法：其一，自蜀郡（成都）西南行，经临邛（邛徕）、严道（荣经）、旄牛（今汉源县境），再沿孙水（安宁河）到邛都（西昌），经会无（会理）、三缝（姜驿）、渡若水后到青蛉（大姚），直达叶榆（大理）。其二，自蜀郡（成都）浮水直南到南安（乐山），转西南行，经峨边到俾水（昭觉），再西南行到邛都（西昌）与第一道会合。

(2) 五尺道 历史上从巴蜀取道朱提滇东北地区到达滇境的交通路线，因有秦“奋六世之余烈”，展拓疆土，开发西南夷，派尝頰略通五尺道之说而称为五尺道。但是，五尺道何时开通为一难题。《史记·西南夷列传》载：“秦时尝頰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关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笮马、僮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秦时尝頰所展拓的路线就是，自僰道（四川宜宾）、经朱提（今滇东北昭通地区）到达曲靖、滇池的路段。由于该路线所经地区山势险峻，横亘众多海拔二三千米以上的高山深谷，道路开凿十分艰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120页。

难，路面宽度必然受到很大限制。据后人推算，五尺道约合现今 1.4 米左右，比照秦汉 1.5 米左右的轮距，此路只够人畜行走。^①

《史记·货殖列传》称四川是“栈道千里，无所不通。……以所多易所鲜。”《史记·索隐》也说“谓栈道广五尺。”这都说明川滇有五尺栈道相通。正因如此，沿途区域才得以设官治理。进而经此通道“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②

秦末汉初战乱不已，边疆事务废弛，古道一度闭塞，出现“皆弃此国，而关蜀故徼”的情况。但是对于事关军国大事的这样一条交通线，统治者当然不会等闲视之，一旦政局趋于稳定，打通这条交通线必将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高后六年（前 182 年），汉王朝便正式在今宜宾西南设置僰道县，为修复古道、经略西南事务奠定了基础。武帝即位后，派唐蒙开辟南夷道的同时，又令其沿五尺道路线开辟“西南夷道”。在开辟“西南夷道”时，先行打通了巴蜀境内的路段，这就是所谓的“僰青衣道”。僰青衣道也有两种走法：其一，自蜀郡（成都）向西行，经青衣（雅安），顺青衣水（青衣江）到南安（乐山），再沿江水（岷江）抵僰道（宜宾）；其二，自蜀郡（成都）浮船沿江水（岷江）往南，过广都、武阳（彭山）、南安（乐山）、犍为抵僰道（宜宾）。成都到宜宾古有水道相通。唐代诗人杜甫在草堂寺写下“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不朽诗句，给后人追寻古代成都对外水路交通情况留下了重要线索。僰青衣道修筑一事，《华阳国志》有载：“武帝初，欲开南中，令蜀通僰、青衣道。建元中，僰道令通之，费功无成，百姓愁怨。司马相如讽谕之。使者唐蒙将南入，以道不通，执

^① 蓝勇《南方丝绸之路》，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20页。

^② 《汉书·西南夷传》。

令，将斩之。令叹曰：‘恭官益土，恨不见成都市。’蒙即令送成都市而杀之。故世为谚曰‘思都邮，斩令头’云。后蒙为都尉，治南夷道。”这段通道开通的时间，据有学者断言，应在开辟犍为郡的前一年，即建元五年（前 139 年）。设犍为郡后，又继续开凿通向南中的西南夷道。《华阳国志·蜀志》称：“元光五年，郡移治南广。”建元六年设犍为郡时，郡治是在犍县，随着西南夷道通达郡治腹地地带的南广后，郡治也就从犍县迁往南广，而犍县也就划归牂牁郡管辖。当时自犍道往南延伸的道路有两条：

一条系通夜郎之南夷道，其路径主要在今贵州境内，但亦可在朱提转道通向云南；另一条为直指滇池地区的西南夷道，目的地是曲靖、滇池一带，其路线走向基本上就沿秦五尺道而行，但其路况比秦五尺道大有改观。《水经注·江水》便称：汉武帝时，唐蒙“凿石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二千余里，山道广丈余，深三四丈。”就是说，这条道路宽阔的地方路面可达一丈以上，通到悬崖之处，则凿成凹槽嵌入岩体三四丈深。这条通道，自宜宾南下渡横江、经大关、昭通、曲靖直抵滇池地区。

从秦代五尺道到汉晋西南夷道的开通，又把巴蜀与南中东部广大地区联系起来。这条道路的开通从政治意义上看，它使中国边疆第一次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开郡县，设官治理。两汉时期，对西南夷用兵，就曾频繁进出此道。元狩元年（前 122 年），天子“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辈间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国。”^①其中一路即是经犍道人滇池。元封二年（前 100 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深、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西夷，滇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汉王朝便在滇王辖境设益州郡，赐滇王印，仍以滇王为实际统治者。后夷民数反，汉多次用兵平叛，所征调兵马前行均离不

^① 《汉书·西南夷传》。

开此道。王莽用兵南中，因燹道艰险，劳民伤财，“燹道以南，山险高深，茂（注：冯茂）驱众远居，数以亿计，吏士离者，乞死者什七”亦经此路。^①两晋时此路仍为川滇交通要道。《华阳国志》载：“自燹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至险难行。步道渡三津，亦艰阻。故行人语曰：‘犹溪、赤木，盘蛇七曲。盘羊、乌椌，气与天通。看都茂泚，住柱乎尹。廉降贾子，左儋七里。’又有牛叩头，马搏颊坂。其险如此。”^②

“五尺道”的开凿意义重大，它不仅为王朝统治云南、实现政治上的利益创造了条件，而且与“巴蜀民”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这条道路是“巴蜀殷富”的重要源泉。正因如此，尽管汉初政府曾以极其严厉的行政命令“闭蜀故徼”，也无法阻止商贾在巴蜀与西南夷之间进行的贸易往还，奴隶贸易的丰厚利润驱使着巴蜀商人甘冒违法之险“窃出商贾”。关于巴蜀与南中的贸易，其所取给的商货，如在灵关道进行的那样，购入者有笮马、燹僮；输出者多为丝织品、金属器及食盐等物品。

(3) 南夷道 汉武帝建元六年，番阳令唐蒙受命出使南越，回到都城长安后报告了他的重大发现，即从巴蜀经夜郎沿牂牁江有秘密商道可通番禺的情况。汉武帝闻知此事后，当即派唐蒙经理“通夜郎道”事宜，这便成为汉朝开发南夷道的直接起因。唐蒙领命后，先取符关道通夜郎。但此路不理想。元光五年，“发巴蜀治南夷道”，遂改由燹道循牂牁江入夜郎境。修筑南夷道的起因，《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甚详：“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

① 《汉书》卷 99（王莽传）。

② 《华阳国志》卷 4 《南中志》。

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曰：‘南粤王黄屋左纛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曰：‘南粤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牂牁，出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上许之。乃拜蒙以郎中将军，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符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厚赐，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牁江，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军往谕，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问题是“发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牁江”，其道是否已通？显然道路是修通了，并且不只一条前面提到，建元六年置犍为郡时，郡治就设在位于夜郎东境的犍县，说明自巴蜀已有通夜郎的道路。这条道应该是自符关入夜郎的通道，否则郡治就不可能孤悬在犍县。至于自犍道入夜郎的道路，其路径据考释应为自犍道（宜宾），经南广（盐津）到平夷（毕节）。但值得说明的是，南夷道并未能与牂牁江相通，入番禺道一时并未打通，浮牂牁江的“制越一奇”之计也未能如愿以偿。故有元鼎五年南越反，汉武帝兼从豫章、长沙、桂阳、零陵与牂牁五路出兵，会攻番禺之举。结果南越已平，牂牁一路尚未能入越者。对此，《史记·南越传》有：“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驰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之叹。之所以“发夜郎兵未下”，无法到达南越，原因就在于道不通。道理很简单，时人并不知晓牂牁江上游属哪条江，也就无法浮船南下番禺了。对于牂牁江属于何水？据说是到了明清云、贵建省后，方志家们才加以考订的。对夜郎位置的不同解释，牂牁江所指各异。从地

理实际判明，这个“夜郎临牂牁江”一语中的“夜郎”，应在今天的云南东部和贵州西部一带濒临北盘江和南盘江的某个地方，牂牁江也就泛指北盘江和南盘江无疑。因此之故，远在黔东南的南夷道当然无从接牂牁江浮船入番禺了。^①

南夷入番禺最终还是通了，蜀枸酱流入番禺也是事实。据现代学者考证，蜀枸酱是秦汉间为数不多的商品之一，其早已行销中原内地，故唐蒙至南越，一见即能识之，从而测知蜀与番禺间有秘密商道相通。当问及此物从何处来时，设食者漫指西北方曰“自牂牁来”。然而，唐蒙也并不确知牂牁为何地，但知番禺城外大河名为“牂牁江”。因念“江水必自牂牁流来，故有此名。其源必近蜀，故蜀枸酱浮船此水运达也。”因此之故，回都城后会有指僂道人牂牁境寻牂牁江之举。

(4) 滇越进桑商道^② 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组成部分的滇越通道始于何时，是研究者们颇为棘手的问题。但可以肯定，它的开辟，其历史一定相当久远。在我国的古籍，其中包括先秦古籍中，有许多关于神农、颛顼、尧、舜等南抚交趾或南至交趾的记载。这些记载反映了我国战国或上溯到春秋、西周甚至更加久远的年代，中原地区就已经和南方的交趾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中国西南地区与越南的往来，见于史籍记载者，是从有关安阳王建立瓯雒国的传说中开始的。《史记索隐》载：“《广州记》云：‘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人。有骆王、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铜印青绶，即今之令长也。后蜀王子将兵

① 牂牁江所指众说纷云。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有：林超民《汉晋云南各民族地区交通概论》（载《西南民族历史研究集刊》，1986年12月）一文指出，牂牁江系指北盘江；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版）书中指出，牂牁江为南盘江。

② 林超民《汉晋云南各民族交通概论》称此道为“滇越卷冷道”；蓝勇《南方丝绸之路》文中称此为“滇越进桑道”，两说系指同一通道。

讨骆侯，自称为安阳王，治封溪县。后南越王尉他攻破安阳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人。”蜀王子至交趾建国之说，见于记载者，除《史记索引》之外，《水经注》引《交州外域记》、《太平寰宇记》卷 170 岭南道十四《交趾县》条、《岭南摭怪》之《金龟传》、《越史略》卷 1 《国初沿革》、《大越史记全书》外记卷 1 《蜀记》、《越史通鉴纲目》卷 1 等中越史书都有类似的记载。蜀王子并文郎，建瓯貉国的时间，《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卷 1 《蜀纪》及《越史通鉴纲目》卷 1 都说是周赧王五十八年（前 257 年）。前书说：“甲辰，元年（原注：周赧王五十八年）。王既并文郎国，改国号曰瓯貉国。”后书说：“周赧王五十八年，蜀王既有文郎，改号曰瓯貉，都封溪（原注：旧史，王姓蜀讳泮，巴蜀人也。时王既并文郎，乃改国号曰瓯貉，都封溪）。”讲到蜀王子建瓯貉国，还有一个问题需加说明。从史书的记载来看，蜀王子建国一说存在矛盾。史称蜀王子即安阳王，而蜀国早亡于秦，蜀王子于周赧五年（前 310 年）或稍后已死，就如《华阳国志》卷 3 所说：“周赧王五年（前 310 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傅相及王子，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这样看来，蜀王子已死，又何来蜀王子称“安阳王”？安阳王建瓯貉国就更无从谈起。对此疑问，我们从《华阳国志》蜀王败走，死武阳，子死白鹿山，但不载安阳王一说可以作这样的推断：很可能在秦灭蜀之时，蜀王室的一支南逃退交趾，败骆侯而以其地称王。^①当然，我们还可以作这样的假设：蜀王有王子多人，有死于秦者，也有逃脱者，后者也就是至交趾建国的安阳王。从以上的史料分析，我们

林超民《汉晋云南各民族地区交通概论》，载《西南民族历史研究集刊》，1986 年 12 月刊，第 153 页。

认定：最迟在公元前 3 世纪初，蜀与交趾已有交通，其道路也必经过南中。其路径的具体走向，结合古今文献记载，大致可确定为：自宁州滇池地区南下赧古（今云南个旧）、经西随县（今蛮耗）、经进桑关（古勇步，今云南河口），沿叶榆水（元江）至泅冷县（今越南永富省富寿地区）到交州，进而与汉代南方海上丝绸之路之路相连接，通缅甸印邑卢没、谶离国、夫甘卢国、黄支国。唐代樊绰、贾耽所记入安南的道路与该路程相似。^①

(5) 滇缅印道 对于南方丝绸之路来说，滇缅印永昌道是直接勾通中国西南与缅甸之间陆路交通的关键路段。官方兴修这条通道，其首倡者为武帝朝博望侯张骞。《史记》卷 116 《西南夷列传》载：“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及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史记》卷 123 《大宛列传》又载：“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其妣水南。……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

林超民《汉晋云南各民族地区交通概论》，载《西南民族历史研究集刊》，1986年12月，第154页；蓝勇《南方丝绸之路》，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26页。

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欣然以騫言为然，乃令騫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犍、出冉、出徙、出樊，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氏、苻，南方闭嵩、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能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这是汉政权指求“蜀身毒道”的开始。虽然政府派出的使者被阻于昆明，但已经了解到昆明以西更远地区的情况，确知川滇与缅印之间民间秘密商道的存在。问题是这条民间秘密商道何时开通？从上文记载的时间来看，应当在张騫大夏见蜀布、邛竹杖之前，即在公元前 122 年以前。但是，在这之前究竟又存在了多久？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得了解古代滇缅和缅印之间的交往情况。

在古代，滇缅之间广阔的地域上存在着一个古老的哀牢国。《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永昌郡，古哀牢国。”据方国瑜先生考释，哀牢部族自九隆始称王，九隆之世应在周赧王（前 314—前 256 年）时或在以前，当公元前 300 年之前。是时，哀牢部族已有称王，其社会经济变化发达较早，境内有富饶的物产，《后汉书》、《华阳国志》诸书均有记载，其中以“哀牢布”为著。《后汉书·西南夷传》、《华阳国志·南中志》称“僮花布”或“白氍毹”，即木棉布，产于哀牢，亦有称为“都布”（榻布、答布）者。^①哀牢部族地域甚广，《华阳国志·南中志》称：哀牢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后汉书·西南夷传》说：哀牢夷“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比之哀牢国更靠近内地的是昆明部族，其位置相当于今天大理、保山之间。昆明与内地巴蜀、荆楚的交往如前所述，早

^①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版，第21页。

于公元前 4 世纪就开始了。古哀牢国就是居于这样一种内接巴蜀、荆楚，外接缅甸、印度，成为古代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古国经济文化交融的枢要地带。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之自身经济文化均较发达的内在因素使然，其对内（与中国内地）对外（与缅甸、印度等国）经济联系也一定具有相当的规模。

古代印缅两国，从地理概念来看是相连的，这为两国商业和文化上的交流扫除了障碍。缅甸与印度的远古关系离不开佛教传播。印度佛教创始于公元前 6 世纪。创立之初即传入了锡兰和缅甸，并经若干世纪后传入中国云南。就是说，缅甸与印度交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6 世纪。^① 在古代历史上，陆路交往远比海上交往来得容易与安全，尤其像缅印这样相邻的国家更是如此。不言而喻，“敢于渡海而来的印度商人、冒险家，首先要有胆量走陆路。”^② 由于这种交往，使得在遥远的古代，在印度和缅甸毗邻的广阔山区，就必然存在某种商业上的联系。当印度处于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即阿输迦，前 273—236 年）统治时期，其东部拥有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包括迦摩缕波（今阿萨姆）及孟加拉的广大地方。为了促进同外部世界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便以佛教的传播为先导，派去大批高僧到外国传教，缅甸便是印度佛教影响最大的国家，从而奠定了缅印间最为坚实的商业和文化上的联系。也正是在孔雀王朝时代，中国西南经缅甸通达印度的

① 《印度最初的帝国》，载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The Times Atlas World History），三联书店，1982 年 4 月版，第 82、83 页。

② [缅] 貌丁昂著、贺圣达译《缅甸史》，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印，第 5 页。